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3 年第 5 期 (总第 274 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美善相生”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论美学意义上的孙犁

贺仲明

摘　要： 孙犁文学具有美善相生的审美品格。这表现在他以善的伦理为认识世界的方式,对美善合一文学世界的展示,以及与善相和谐的艺术特征上。孙犁审美品格的主体资源是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同时融汇了现代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和艺术方法。审美品格是孙犁个人精神和人格的写照,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创作道路和文体选择。孙犁的审美品格与他生活的时代文化存在一定冲突,也因此未能在他的创作中得到充分发挥,但它使孙犁作品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意蕴,也切合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既超越了时代,也展示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现代价值及开放性发展的方法。孙犁的审美品格非常切合当前中国的文化要求,对中国文学具有充分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 善;美;孙犁;民族
中图分类号:I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23)05-0132-10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作家,孙犁的诸多方面都得到了人们较丰富的研究,包括很多学者曾指出过他的创作关注“善”,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还缺乏对孙犁创作美学的系统研究①,特别是没有将“善”与其美学特色进行关联研究。事实上,善不仅是孙犁创作的重要内容,更渗透到其审美精神中,构成他“美善相生”的审美品格。这一品格既造就了孙犁创作的深刻性和创造性,也蕴含着丰富的启迪性内涵,值得从美学角度进行深入探究。

一

孙犁创作“美善相生”的审美品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者简介:贺仲明,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乡土小说审美变迁研究(1949—2015)”(16AZW015)的阶段性成果。

① 阎庆生的专著和系列论文对孙犁美学思想有所研究,但其研究主要侧重于文学思想层面,较少涉及具体文学创作,而且比较侧重于孙犁的晚年思想。参见阎庆生:《晚年孙犁研究:美学与心理学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其一,以善为美的美学观念。孙犁作品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从善的伦理出发认识和看待世界。孙犁曾经这样谈论自己进入文学创作的初衷:“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①这一自述,结合评论家鲍昌对孙犁创作的概括,“对人民(主要是农民)有着深厚的爱。这种爱我怀疑在他的思想中往往超过了他对一般政治问题的思考,从而成为他进行创作的根本契机”②,都准确地体现了孙犁文学创作的根本在于对“善”的追求,其认识世界的基本立场也是“善”。

孙犁文学创作主要包括抗日战争和土改、合作化运动等题材,与同类题材的绝大多数作家不同,孙犁很少从政治角度出发,而主要是立足于人的解放和伦理文化层面,从“善”的角度来进行阐释和书写。如其作品表达对土改运动的认识,就是基于朴素的平等、正义思想。乡村社会存在着强烈的贫富差距、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孙犁认同和支持土改运动的重要原因,政治内涵是这一前提的附着。典型如《一别十年同口镇》,作品充分肯定了土改运动的效果,立足点就是对平等正义的实施和对道德状况的改善。所以,作品对拒绝改造的地主的否定,既有不劳而获、剥削人民的政治内涵,更是否定好逸恶劳和游手好闲等道德品质。而对那个接受改造依靠自己劳动生活的富农,孙犁就给予了肯定。③ 同样,《农村速写·王香菊》中贫农王香菊对地主的不满,主要针对的是财富不均导致劳动工具的不能充分利用。而革命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对人心灵的解放,“翻身”也被有意识地解读为“翻心”。④ 孙犁对“合作化运动”的理解也是如此。《铁木前传》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它与柳青、赵树理等同时代作家的政治视角不同,它书写的出发点是对美好人性人情的维护,关注的是人和人的关系:“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⑤作品中表达对合作化运动认可和支持的基础,是对财富、享受等生活方式对年轻人美好心灵腐蚀的批判和不满,是对善良、真诚等传统善的伦理受到冲击时的叹息和感伤。

孙犁的战争书写更具代表性。他之赞颂抗日战争,之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愤怒,都充分立足于人们日常生活、家庭亲情和民族国家等伦理层面,其内在基础是对遭受战争戕害的老人、儿童、妇女的深刻同情,是对老百姓平静生活被战争破坏的强烈反感。所以,孙犁小说中的抗战故事,都是将家庭亲情、友情、爱情与民族国家之情关联在一起,是真正将战争本质理解为“保家卫国”。孙犁笔下的抗战英雄,不只是战斗勇敢,同时还具有勤劳、善良、乐于助人等伦理品格。他所展现的军民关系,也不只是缘于战争政治,更包含着家人一样的相互扶持和关爱。《碑》中那对农民老人对为保护他们而牺牲的八路军连长的感情,已经与真正的亲人没有任何区别。《琴和箫》中老人对那对少年兄妹的感情,也与祖父对孙儿女的关爱和痛惜没有两样。《浇园》中八路军战士与乡村女孩的感情,更是很难辨别究竟是军民感情还是男女爱情。对此,《风云初记》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对战争与人、与日常生活的密切关联:“因为,有了妻子,就有了牵连,也就有了保卫她们的责任。生活幸福,保卫祖国的感情也就更加深了”⑥,“家乡啊!你儿女众多,你贡献重大,你珍爱节操,你不容一丝一点侵辱,你正在愤怒!” ⑦

孙犁的晚年写作多是对“文革”等往昔生活的回顾,视角同样是以伦理为中心。孙犁在“文革”中受过很多磨难,但他的作品很少谈及自己的遭遇,也很少从政治方面来评判运动,他主要是从伦理和人性角度表达对故人的怀念、同情和惋惜之情,记叙运动中让他感动的真诚和同情。包括对那些曾经风云一

①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4-145 页。

② 鲍昌:《孙犁——一位有风格的作家》,《河北文学》1980 年第 7 期。

③ 孙犁:《孙犁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9-162 页。

④ 孙犁:《孙犁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4-177 页。

⑤ 孙犁:《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543 页。

⑥ 孙犁:《风云初记》,《孙犁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6 页。

⑦ 孙犁:《风云初记》,《孙犁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48 页。

时的政治人物(如《芸斋小说》中之《王婉》《冯前》、《如云集》中之《悼曼晴》等),孙犁都很少涉及政治评价,只是褒贬其道德人品,叹惋其人生际遇。

与文学创作完全一致,孙犁的文学思想也传达出以善为中心的审美思想。这一点最典型的体现是在孙犁晚年。晚年孙犁多次表达自己的文学观念,它们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与伦理道德相关的基础上,部分观点甚至是将文学作为伦理思想的化身,将教育视为文学最重要的使命。比如他这样理解文学的本质:“艺术家创造出美的形象,以之美化人类的心灵,使之向善,此即谓之美育”①,“文学艺术,除去给人以美的感受外,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教育手段,即为了加强和发展人类的道德观念而存在。文学作品不只反映现实,还要改善人类的道德观念,发扬一种理想”②。他所寄予高度认可的文学也是以善为中心:“他们的吟歌,大抵是为民族,为国家,为群众的幸福前景着想。用心如此,发为语言文字,无论是歌颂、悲愤、哀怨、悲伤,从内容到形式,都出自美和善的愿望。”③包括对自己一生文学创作成就评价时,孙犁也是明确的伦理道德角度:“看看是否有愧于天理良心,是否有愧于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④虽然晚年思想不能作为孙犁全部文学思想的概括,但它们与孙犁的创作整体并不冲突,而是有着内在的一致,显示他思想与创作之间的共同性特征。

其二,美善合一的文学世界。孙犁的文学世界里当然不只是善,它们也同时是美的结晶。准确地说,孙犁是以善为前提来书写美,努力保持对善的肯定和期盼,并赋予善以美好的形态。他笔下的美,也因此而具有了善的内涵,成为善的一部分。孙犁作品建构的文学世界,是美和善相统一的世界。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孙犁一直努力发掘和书写生活中的美好,而尽量回避生活中的丑和恶。他的战争题材作品中极少写到悲剧事件,更少直面死亡和丑恶。他还多次把生活中遭遇到的不愉快事情,进行美化处理,改变其本来面目。如《山地回忆》《访旧》等作品,生活原型都渗透着世态炎凉和人情淡漠,但作者在小说中都把它们写成了美和善的赞歌。在评价其他人的文学作品时,他也是同样的态度:“但是,你的终篇,却是一个悲剧。我看到最后,心情很沉重。我不反对写悲剧结局,其实,这篇作品完全可以跳出这个悲剧结局。也许这个写法,更符合当时的现实和要求。我想,就是当时,也完全可以叫善与美的力量,当场击败那邪恶的力量的。”⑤这显然是缘于孙犁对善的珍爱,他不愿意书写善的毁灭,而是尽量赋予它良好的结局和美丽的形貌,保持其品质和尊严。

孙犁战争题材作品的人物塑造充分体现出这一点。他书写最多的人物形象是儿童、妇女和老人。在战争中,这些人无疑是弱小者。而且,他(她)们基本上都具有善良的品格,青年女性更是美和善的结合体——既具有外表美,又都善良忠贞、勤劳、爱家,是中国传统女性美德的化身。孙犁通过书写战争给予他(她)们的伤害和创痛,既表达出人性关怀和怜惜的感情,也对侵略战争进行了严厉否定和谴责。但是,孙犁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些人物的弱小,更没有去渲染他(她)们的悲剧命运,而是表现他(她)们的顽强和不屈,挖掘他(她)们弱小背后的坚韧精神。如他这样书写在战争环境下被迫出生在地洞里的女孩:“女孩子的第一次哭声只有母亲和那深深相隔不远的井水能听见,哭声是非常悲哀和闷塞的。在外面的大地里,风还是吹着,太阳还是照着,豆花谢了结了实,瓜儿熟了落了蒂,人们还在受着苦难,在田野里进行着斗争。”⑥这样书写被战争戕害致死的李佩钟——在牺牲前,她依然保持着美丽的形貌:“她那苗细的高高的身影,她那长长的白嫩的脸庞,她那一双真挚多情的眼睛,现在还在我脑子里流

① 孙犁:《孙犁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84 页。
② 吴泰昌:《一次愉快的对话》,《梦的记忆》,花城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7 页。
③ 孙犁:《小说杂谈》,《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08 页。
④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1 页。
⑤ 孙犁:《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的通信》,《孙犁全集》第 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72 页。
⑥ 孙犁:《“藏”》,《孙犁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4 页。

连,……”①

也就是说,孙犁书写这些女性的重要意图,就是通过对她们积极乐观生活态度的渲染,赋予对善的希望和信心。这些女性既是善和美的结合体,同时又承担着以美来慰藉受伤害的善的使命,她们是善的鼓励者和期待者。这一点,与孙犁对女性的认识完全一致:“二十多年里,我确实相信曹雪芹的话: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②,“我在农村中遇到过的那些妇女,她们并没有多少学问,但她们都能直觉地认识到斗争的实质。她们总是那么奋发、乐观、勇敢,特别是那些青年妇女。为了解放斗争,情愿献出自己最心爱的人:丈夫、儿子、情人,献出她们全部的爱”。③

孙犁作品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细节特点,典型地体现出其文学世界的美善结合,那就是洁净。孙犁很多小说作品都很着意描述人物环境的洁净。特别是对正面人物生活场景的书写,他(她)们的生活环境可能是贫穷、简陋的,但却无一例外是整洁干净的。著名的如《荷花淀》开头对水生嫂编席场景优美洁净特征的描述;《村歌》对双眉住所的描写也是这样:“别的陈设也不多,可是拾掇打扫擦洗得明亮干净”④;《铁木前传》也这样书写小满儿打扫过的住所:“小小的擦抹得很干净的炕桌上面,放着灌得满满的一个热水瓶;一盏洋油灯,罩子擦得很亮,捻小了灯头。摸了摸炕,也很暖和”⑤。洁净,既是一种环境的外观,却也折射着内在的精神,它既蕴含着内在的自尊,也是勤劳品格的体现。可以说,洁净以内在的善的本质赋予了孙犁文学世界更丰富的美感。

第三,美善和谐的艺术形式。善虽然是一种伦理文化,但其内涵与美有密切的关联,其呈现关联着一些特定的艺术表达。比如说真诚的情感。中国古代的朱熹曾说:“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仁说》)韩愈也表示:“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原道》)西方伦理学家同样强调真诚情感与善的关系。“在舍勒看来,爱的范围涉及除道德的善的价值之外其他全部价值对象。在《论同情》一书中,舍勒强调了这一点,并且指出:一个人所具有的善的程度只取决于他所付出的爱的程度”⑥。显然,真诚情感与善之间具有内在的和谐与统一。同样,正如《论语》所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阳货》)庄子也说过:“为善无近名。”(《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善的表现往往采用温和、轻柔、内敛的方式,与暴烈、凶猛、张扬是相对立的。

孙犁作品的艺术表现与善的内涵有着高度的和谐和统一,最突出的是强烈情感色彩。孙犁曾经明确表示过对文学作品感情真实的认同:“所谓感情真实,就是如实地写出作者当时的身份、处境、思想、心情,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关系。”⑦他的作品也充盈着强烈而丰富的情感色彩。他曾这样阐释自己的抗战小说:“我写出了自己的感情,就是写出了所有离家抗日战士的感情,所有送走自己儿子、丈夫的人们的感情。我表现的感情是发自内心的,每个和我生活经历相同的人,就会受到感动。”⑧确实,将自己感情与人物感情融为一体,甚至直接对作品中的人物和生活抒发感情,是孙犁小说作品的重要艺术特点。比如《铁木前传》开头的情感表现,就是将自己的人生感喟与作品故事充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相互呼应和感染的效果:“在人们的童年里,什么事物,留下的印象最深刻?如果是在农村里长大的,那时候,农村里的物质生活是穷苦的,文化生活是贫乏的……童年啊!在默默的注视里,你们想念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⑨孙犁的晚年散文创作也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其中有对战争时代战友、军民情感的深

① 孙犁:《风云初记》,《孙犁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5页。
② 孙犁:《谈铁凝的〈哦,香雪〉》,《孙犁文集 续编2》,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③ 吕剑:《孙犁会见记》,原载《新港》1979年第10期,收入《孙犁作品评论集》,天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11-312页。
④ 孙犁:《村歌》,《孙犁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⑤ 孙犁:《铁木前传》,《孙犁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页。
⑥ 弗林斯:《舍勒思想评述》,王芃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⑦ 孙犁:《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孙犁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页。
⑧ 孙犁:《关于〈荷花淀〉的写作》,《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19页。
⑨ 孙犁:《铁木前传》,《孙犁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81页。

情怀念,有对一些生活弱者和苦难者的满怀同情,也有对自己某些遗憾的慨叹和惋惜,包括对自己一些往事非常坦率的忏悔。就如孙犁对文学虚假的明确否定:“文学创作虚假编造,虽出自革命的动机,尚不能久存,况并非为了大众,贪图私利者所为乎。”①这些真挚的情感,传达出孙犁对人生的多重感慨和对历史的深沉喟叹。

也许是因为对真诚的追求过于急切,孙犁晚期散文的部分篇章在表达上经常有情感溢于外,因此而存在不够含蓄深沉的特点。相比之下,孙犁早期小说在情感表现上更为成熟。这些作品感情深切,也有直接抒情,但更多是借助于景物描写、日常生活细节,无形而含蓄地传达感情,从而将真诚情感之美与含蓄蕴藉之美很好地进行了结合。

比如《荷花淀》《嘱咐》等作品,都具有强烈深刻的感情色彩,但它们的表达方式都含蓄委婉。如水生对父亲和妻子表达感情的方式都是完全生活化的语言,人物情感在日常琐事中得到体现。此外,孙犁还很擅长将情感隐藏在客观描写中。如《村歌》写老邴对双眉外表美的感受:“老邴看准了她的脸,她的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②丝毫没有描述老邴的内心世界,但细节当中却明确传达出他对美的爱慕情感。至于通过景物描写来揭示人物心理和情感,《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中都有非常丰富的表现。如这是《铁木前传》对小满儿内心苦闷的书写:“园子里有一棵小桃树,也叫流沙压得弯弯地倒在地上。小满儿用手刨了刨沙土,叫小桃树直起腰来,然后找了些干草,把树身包裹起来。她在沙岗的避风处坐了下来,有一只大公鸡在沙岗上高声啼叫,干枯的白杨叶子,落到她的怀里。她忽然觉得很难过,一个人掩着脸,啼哭起来。”③《风云初记》也将自然风景对春儿的美和单纯做了很好的映衬:“这时候,春儿躺在自己家里炕头上,睡得很香甜,并不知道在这样夜深时,会有人想念她。她也听不见身边的姐姐长久的翻身和梦里的热情的喃喃。养在窗外葫芦架上的一只嫩绿的蝈蝈儿吸饱了露水,叫得正高兴,葫芦沉重地下垂,遍体生着像婴儿嫩皮上的绒毛,露水穿过绒毛滴落。架上面,一朵宽大的白花,挺着长长的箭,向着天空开放了。蝈蝈儿叫着,慢慢爬到那里去。”④

以上可以看出,孙犁文学的美和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美赋予善以更好的形态和色彩,善也使美更充盈丰富,它们互相包含和呼应,又相互促进和发展。尽管孙犁的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对美和善的表现存在一定差异,作品面貌甚至具有较大反差,但对善的向往,对美的执著,却毫无疑问是它们的共同特征。特别是孙犁的小说创作,完全构成一个善与美交相辉映的精彩舞台,那些集美丽外表和善良伦理于一体的女性群体,是舞台上最亮丽的中心,而美和善的人性情感,对生活的真挚热情和强烈希望,则弥漫于孙犁文学的每一角落,呈现出真诚乐观的精神特征。

二

文如其人,孙犁的审美品格,在最外在的层面上来自于他的个人品质和性格,来自于他内心深处的善良,可以看作是他精神世界的充分体现。

孙犁曾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我少年时,追慕善良,信奉道义。只知有恶社会,不知有恶人。古人善恶之说,君子小人之别,以为是庸俗之见。”⑤孙犁不是一个性格外向、朋友很多的人,但正如他助手的回忆,他的为人是非常善良的。⑥ 如孙犁自己所说:“在运动中,我是没有按过别人的。”⑦看到“文革”中

① 孙犁:《读萧红作品记》,《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71 页。
② 孙犁:《村歌》,《孙犁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 页。
③ 孙犁:《铁木前传》,《孙犁全集》第 2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9-130 页。
④ 孙犁:《风云初记》,《孙犁全集》第 4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2-13 页。
⑤ 孙犁:《读〈旧唐书〉记》,《孙犁全集》第 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87 页。
⑥ 王家斌:《孙犁的与人为善》,《慈善》2018 年第 4 期。
⑦ 孙犁:《冯前》,《孙犁全集》第 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71 页。

斗争人的场面,孙犁也是“心里非常难过”①。所以,他尽量避开各种人事纠纷,保持自己正直的人格,不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在当时背景下,这是非常难得的。在他晚年回顾往事的散文中,也可以充分感受得到孙犁为人的善良。作品中充满对朋友的真挚关心和怀念,对被生活摧残和伤害的弱者的同情,以及对自己的严厉反思。可以说,孙犁的做人原则都是首先考虑他人,以与人为善为中心。这正如他一篇作品表达的感慨:“只有寒冷的人,才贪婪地追求一些温暖,知道别人的冷的感觉;只有病弱不幸的人,才贪婪地拼着这个生命去追求健康、幸福;……只有从幼小在冷淡里长成的人,他才爬上树梢吹起口琴。”②

当然,作为一名作家,孙犁具有对美的热爱和敏感,他也会在理解和表达美的时候将善的内涵融入其中,或者说自觉地从善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美和表现美。孙犁晚年有一篇《我留下了声音》的散文,充分表现了孙犁的这一特点。③ 作品真切传达了孙犁对美的喜爱和依恋之情,在他的理解中,人物的外表美与内在美——也就是内心的善——应该具有天然的合一。尽管文章表达了对现实的失望,但在文学世界中,这一特点却深刻而坚韧。

人是文化的产物,孙犁的这些性格和行为,与他的家庭和成长环境,以及接受的熏陶和教育都有着深刻的关系。就主体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其背后最重要的底色。孙犁童年时代受到的家庭教育,他身为地方乡绅的父亲和恪守传统伦理的母亲,都深刻地影响了孙犁的人格和审美品格。孙犁一直对父亲保持很高的尊重和深厚的感情,对母亲的启蒙教导“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更是到晚年还记忆深刻。④ 晚年孙犁对中国古代典籍的广泛阅读则更深化了传统文化对他的滋养。

具体说,孙犁审美品格的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子。比如,在最根本的以善的伦理作为认识世界方式上,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家孟子“性本善”观念的影子。事实上,孙犁在晚年的一篇散文中,就明确表示了自己对这一观念的高度认同:“中国古代哲学家,从人类的进化和完善着眼,一贯把性善作为人的本性肯定地提出。”⑤再如孙犁从“家国情怀”角度对战争的理解,也与儒家伦理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儒家文化强调修身-持家-治国,内在思想逻辑就是家国一体,国家是个人精神的归宿地,属于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孙犁正是立足于这样的认识,从民族国家的大善和大爱的角度出发,才以赞美的态度来认识抗日战争。而且,因为在民族抗战的背景下,人们更增添了相互依存和相互信赖的情感,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感情和善良人性得到更充分的表现,所以,孙犁才表示:“我现在已经快七十岁,我经历了我们国家民族的重大变革,经历了战争、乱离、灾难、忧患。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⑥

当然,孙犁的审美品格绝不只是传统文化的产物,而是融入了很多的现代思想和文学内涵。他作品中充盈的对弱者的关怀和对人性的关爱,既可以看到孔子“仁者爱人”和儒家“民本”思想,也渗透有西方人道主义思想。艺术上,孙犁作品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以及具有强烈抒情色彩的风景描写中,可以看到西方文学细描方法的较大影响,而其含蓄蕴藉之美,则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节制、谦逊与中庸美学的特点。⑦ 特别是孙犁塑造的小满儿(《铁木前传》)、双眉(《村歌》)、慧秀(《钟》)、李佩钟(《风

① 孙犁:《书林秋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年版,第 344 页。

② 孙犁:《芦花荡·邢兰》,《孙犁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51 页。

③ 孙犁:《我留下了声音》,《孙犁全集》第 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4-17 页。

④ 参见孙犁:《诗外功夫》,《陋巷集》,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04 页。另,关于孙犁的童年记述亦可参见孙犁:《〈善暗室纪年〉摘抄》,《陋巷集》,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6 页。

⑤ 孙犁:《答吴泰昌问》,《孙犁全集》第 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 页。

⑥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4-145 页

⑦ 对于孙犁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阎庆生的系列论文已有比较全面细致的论述。参见阎庆生:《孙犁与中国传统美学关系之整体观——兼论孙犁晚年文学创作的现代转型》,《文艺理论研究》2005 年第 2 期;《论孙犁崇尚“平淡”的审美意识——兼论孙犁文学创作的美学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5 期。

云初记》)等具有较强叛逆个性和独立思想精神的女性形象,无论是从审美还是从精神层面,都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较大差异,主体内涵是现代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可以说,孙犁审美品格中融合了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多种元素,它们是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多文化的内在而自然结合。

这一方面缘于人类文化具有很多共同性,以善为中心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之间存在很多相通之处。更重要的,还是孙犁能够对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与西方文学(文化)持客观而融合的认识态度:“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倒是多接受了一些西洋的东西,这当然和五四运动的精神有总的关联,而且也不是徒然的。但是这样做,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损失,它使文学局限在少数知识青年的圈子里,和广大劳动人民失去了联系。”所以,他对中国传统文学能够有批判地继承和学习的愿望:“很多人以为中国旧小说的传统是传奇的,但仔细研究宋人话本和几部优秀的长篇,其长处还在于丰富地反映了当时当地人民的生活,反映了很多当时的社会制度……叫广大人民从新的认识上阅读它们,学习它们。”①而对西方文学,孙犁既持开放和学习的态度,但也不是一味地接受,而是有自己的主体选择立场。比如他曾经高度评价过人道主义:“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②但他只对契诃夫、托尔斯泰等作家予以充分认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较多现代意识、与中国文化差别较大的作家却有所批评和否定。③

孙犁的美学品格来源于其生活经历和文化世界中,这种品格也融入到其人格中,对其生活方式、人格特征产生深刻的影响,可以看作是他个人精神品格的外化。从生活方面说,孙犁一直对城市生活感到烦扰,对农村生活充满怀念,就与之有所关联。一方面,在孙犁看来,城市密切关联着物质文化,与他善和美的审美原则构成严重冲突。他在城市生活中见识了太多的纷争和丑恶:“城市是个非常复杂的所在,人也是很混杂的,它固然可以是首善之区,藏龙卧虎;但也可以是罪恶的渊薮,藏污纳垢。”④于是,他努力采取避世而居的方式远离是非:“余之晚年,蛰居都市,厌见扰攘,畏闻恶声,足不出户,自喻为画地为牢。”⑤另一方面,乡村的宁静、美的自然以及往事记忆中的人情美唤起他对乡村伦理的美好记忆,激发起他对乡村和农民的关怀之情:“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但我一直热爱它,留恋它,怀念它。直到现在,我已经很老了,还经常不断地做梦,在它那里流连忘返。”⑥有件事可以体现。20 世纪 50 年代,在一次看到有关农村灾情新闻的电影后,孙犁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难过的心情:“难过不在于他们把我拉回灾难的农村生活里去,难过在于我同他们虽然共过一个长时期的忧患,但是今天我的生活已经提高了,而他们还不能,并且是短时间还不能过到类似我今天的生活。”⑦

孙犁的美学品格还密切关联着其文学创作的兴盛与衰微,以及对文体的选择和文体特征。如前所述,孙犁讴歌抗战,是因为他在战争中看到了民族大爱和人性之善,他对美善的寻觅和赞美中寄托着他对生活的希望,他所营造的美善世界是他生命的信心。所以,他的创作在抗战中达到高峰。对于“文革”后的孙犁,文学之美更成了他维系对善、对人生信心的重要方式:“风雨交加,坎坷满路。余至晚年,极不愿回首往事,亦不愿再见悲惨、丑恶,自伤心神。然每遇人间美好、善良,虽属邂逅之情谊,无心之施与,亦追求留恋,念念不忘,以自慰藉。”⑧

文体选择上的影响则典型体现在孙犁创作的晚期。经历过“文革”后的孙犁,对虚假已经有了本能

① 孙犁:《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学遗产》,《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05-406 页。
②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5 页。
③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4-155 页。
④ 孙犁:《关于“乡土文学”》,《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58 页。
⑤ 孙犁:《一九五六年的旅行》,《老荒集》,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2 页。
⑥ 孙犁:《文学与乡土》,《老荒集》,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7 页。
⑦ 孙犁著,金梅编:《两天日记》,《孙犁自叙》,团结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21 页。
⑧ 孙犁:《我留下了声音》,《孙犁全集》第 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 页。

的反感,以至于对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文体都产生了拒绝的情绪,对以真实为基础的散文有了独特的热爱。其晚年创作基本上都是散文,即使是命名为“芸斋小说”的作品实际上也都是对生活的纪实性书写。这一点,孙犁自己有明确的表达:“看到真善美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①,“这种东西(指虚伪和罪恶。引者按)太多了,它们排挤、压抑,直至销毁我头脑中固有的,真善美的思想和感情。……它受的伤太重了,它要休养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假如我把这些感受写成小说,那将是另一种面貌,另一种风格。我不愿意改变我原来的风格,因此,我暂时决定不写小说”。②

在审美风格上,孙犁的小说与散文构成比较鲜明的反差。他的小说尽管也有感伤,但整体上无疑是积极乐观,是满怀着对生活的信心和希望的。但晚年散文创作,情绪却较为消沉,对现实的批判和幻灭感也较强。这既缘于现实生活对他的影响,也可以看作是孙犁善美相生的审美品质在不同背景下的存在方式。如果说前者呈现的是强烈的美善向往和追求精神,后者则蕴含着追求无果之后的失落和虚无情绪。

三

尽管孙犁的审美品格与孙犁的个人气质具有深刻关联,并贯穿其一生创作,但它并没有得到充分完全的发挥。这主要源于外在环境的制约。孙犁一生中经历了两个大的事件,一是抗日战争,二是以“文革”为中心的政治运动。二者虽然性质有别,但在本质上与孙犁所秉持的美善精神都是对立的。战争是以武力对生命的伤害,“文革”也充满了各种暴力,构成了对许多人生命和精神上的伤害。孙犁的“美善”审美品格不能为时代所认可甚至产生冲突,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孙犁的战争小说就有这样的遭遇。尽管孙犁的抗战作品坚定地谴责了侵略者,歌颂了保卫家园的爱国战士,但因为它以善的伦理为视角的叙述方式,侧重于关注个人而较少直面书写战争过程,更回避了战争中的残酷,因此,孙犁的小说多次受到时代的批评和责难,在文学史的评价中也长期处在边缘位置。同样,孙犁的小说与多次政治运动之间也有很多不和谐。如《秋千》《一别十年同口镇》等作品因为阶级立场问题也受到批评和指责。

外在环境之外,时代还以另一种方式影响着孙犁的创作,那就是对作家内心世界的压力。孙犁从善的愿望出发,在其战争小说中努力避开战争的阴暗,寻找和挖掘战争中的爱和激情,但战争的严酷毕竟是客观存在,并不可避免地会给孙犁的心灵世界造成巨大伤害——对于孙犁这样一个以“善”为中心的敏感的,也很谨慎的作家来说,他内心自然会承受到巨大的压力。在与朋友田间的通信中,孙犁曾明确表达过这种压力:“从去年回来,我的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虑……关于创作,说是苦闷,也不尽然。这主要是不知怎么自己有这么一种定见了:我没有希望。原因是生活和斗争都太空虚。”③现实和精神的双重压力,导致了 20 世纪 50 年代正处盛年的孙犁创作的中断,其重要作品《铁木前传》成了未竟之作。即使是已经完成的《风云初记》也受各种影响,未能实现孙犁的创作初衷。④

“文革”的影响更为深刻也更为复杂。一方面,艰难而残酷的生活经历,迫使晚年孙犁放弃了自己的小说创作,但更深层的影响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对其美学思想的扭曲。具体说,就是因为对现实中伦

①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孙犁文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5 页。
② 孙犁:《戏的梦》,《孙犁全集》第 5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4 页。
③ 孙犁:《给田间的两封信》,《孙犁全集》第 8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59-460 页。
④ 参见贺仲明:《文体·传统·政治——论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扬子江评论》2018 年第 1 期。

理变迁的特别敏感(也就是“善”在“文革”中的遭受摧残),他过于急迫地希望文学能够强化“善”的内涵,而失去了早期在美和善之间保持的和谐。其一些观念有些偏激,传统和伦理色彩更浓,现代和美学色彩较弱。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阎庆生高度评价晚年孙犁的观念不太认可。尽管我也认为学术界应该更充分认识孙犁文学价值、给予孙犁更高文学史地位,但也不可忽视晚年孙犁的局限——或者说是历史给予孙犁的另一重伤害。

不能简单地责难时代。任何人都是时代的产物,也难以完全突破时代的囿限。就孙犁而言,时代对他的审美品格有所限制,但时代也是孙犁审美品格的重要促生者。特别是抗战,在孙犁对美善关系独特而深入的理解中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激励作用。从这个角度说,孙犁审美品格与时代之间也具有一定的共生性,他的文学成就和缺陷都是不可分割的部分。而尽管孙犁的审美品格未能得到全面的发挥,但他创作中呈现出来的部分,也已经具有了相当突出的价值意义。

其一,独特而深刻的思想内涵。

文学史界对孙犁小说的美善个性、回避丑恶的特点,一直存有争议。但其实,没有完美和周全的作品,文学本就存在多种风格,任何一种特长也就同时意味着它另一方面的缺失。毫无疑问,孙犁立足于美善的文学是具有深度和厚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孙犁的善并不狭隘,更不是简单的说教,而是善与美的紧密结合,是二者的和谐统一。所以,孙犁的审美品格回避战争血腥和死亡,貌似对“真”有所遮蔽和背离,但实际上,它们立足于人性角度的关怀精神,丝毫不违背以“人”为中心的文学基本原则,他只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切入对战争的谴责和否定,是以心灵真诚为基础对“真实”的另一种抵达。同样,孙犁的战争书写表达对抗战的歌颂,从表面看,与以否定战争为目的的人道主义思想有所冲突,但实际上,他歌颂的远非战争本身,而是那些为正义战争而牺牲的人,这些人参与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遏制战争,为了获得和平和安宁。所以,孙犁作品与反战主题并不矛盾,而是另一种表达方式而已。

孙犁独特深刻的思想内涵,使孙犁在时代文学中具有突出的意义,他既显示出独特个性,更对时代有所超越。特别是在时过境迁之后,孙犁的文学魅力更为显著,“以其所呈现的朴素大美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①。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孙犁的文学影响会更加深远,他的文学地位也会更高。

其二,彰显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现代意义。

如前所述,孙犁文学审美品格从根本上是中国传统美学现代化的呈现,或者换句话说,是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与西方文化的结合。这在根本上源于中西审美文化的相通性。中西方古代审美思想中都有将美和善密切关联的观点。如许慎《说文解字》对“美”“善”的解读充分阐释了中国文化的这一传统:“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②西方哲学和文学理论的重要开创者柏拉图也曾经说过:“凡是善的事物都是美的”,“真理和知识都是美好的事物,而善是另外一样事物,比它们更美好”。③ 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近现代西方文化中审美的独立性更强,像唯美主义思潮更是有意识排斥美与伦理(善)关系。中国审美文化虽然也有变化,但却始终保持与伦理之间的较密切联系。

中国现代文学接受的是现代西方文化的洗礼,在其影响下,无论在创作界还是在理论界,很多人都不认可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现代价值,将其作为传统思想文化的一部分予以否定和抛弃。毫无疑问,中国现代文学的转型是绝对必需,中国传统审美思想也确实存在过于依附伦理、匮乏独立性的缺陷,对它的扬弃非常有必要。但是,最恰当的方式也许不是简单否定,特别是考虑到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它没有宗教,而是依靠文学和伦理文化来承担民族国家的精神信仰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孙犁文学显示了其典

① 铁凝:《怀念孙犁先生》,《人民文学》2002 年第 11 期。

②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78 页。

③ 柏拉图:《蒂迈欧篇》《国家篇》,《柏拉图全集》(增订版)中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20 页、第 220 页。另参见王柯平:《柏拉图的美善论辨析》,《哲学动态》2008 年第 1 期。

范性意义:它昭示出中国传统审美思想并没有完全失去意义。只要能对它进行现代化的改造,赋予它新的生活内容,与现代化思想进行深度结合,它完全可以具有新的生命力。这一意义并不突兀,也绝非偶然,从根本上说,美的重要价值之一是净化人的心灵,让人们的生活和世界变得更美好。这就像徐复观说过的:“乐与仁的会通统一,即是艺术与道德,在其最深的根底中,同时,也即是在其最高的境界中,会得到自然而然的融和统一。”①美与善应该并行不悖、相互促进,所以,孙犁审美品格对传统审美思想意义的彰显,在根本上来自对“美善相通”美学本质的回归。

其三,开放性改造和发展民族审美思想的方法学意义。

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现代性改造必不可少。在这当中,以开放的态度学习外来文化是重要内容。这一点,与我们引进和学习西方文化也需要经过本土化过程,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两方面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学习西方文学(文化)的目的,是把它们融入到创作和思想实践当中,是让它们与民族传统相融合,最终汇入到中国文学(文化)的传统长河。在这两者之间,如何既保持独立的主体性,又具备高度自信的开放精神,是艰难的课题。孙犁的审美品格虽然不能说完美,但无疑是很成功,也是具有榜样意义的。它以民族审美文化为主体,又学习和吸纳外来文化,使他的审美品格具有充分的开放性内涵,融会了中西文化、或者说是人类共有的以人性为基础的文化。特别是他的小说艺术,深入融汇中西审美特征,既新颖独特又有深刻底蕴,体现了深刻而高超的艺术价值。

这当中,特别值得提出孙犁审美品格对于民族文化发展的意义。因为孙犁的审美品格来自民族传统,因此能够与民族审美心理有高度契合,对人们深层文化记忆具有激活和鼓励的作用,也促进了民族文化、民族审美的文化传承。与此同时,孙犁借助西方文化,也拓展了民族文化的情感内涵,丰富人们对人性善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说,孙犁作品不像他同时期一些受到大众欢迎的作品一样,依靠的是通俗化文学形式,更不是对大众趣味的迎合,而是真正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孙犁审美品格还具有针砭现实的意义。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巨大转型,高速发展的物质文化和高科技文化潮流也给整个人类伦理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社会文化产生了很多精神困境,亟待创造性的重建。在这种情况下,文学非常有必要强化其与善相一致的内涵特征,以文学的力量对抗物质文化的侵凌,维持人类的真善美追求。时代需要美善,也呼唤张扬善和美的文学。在这一背景下,孙犁的审美品格显示出与时代的高度切合,促使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对文学意义做出新的定位。这并非偶然,而是由于文学意义并非固定,它更需要适应时代发展。而说到底,任何对文学的认识都不应该脱离“真善美”的基本内涵。由此说,在有的时候,现实即永恒,永恒也即现实。孙犁的文学和审美品格充分显示出这一点。

(责任编辑:素微)

①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11 页。